

引 言

五千年岁月风烟悄然划过。清王朝以至今天的我们便有了继承传统的幸运。这传统是亮丽与美艳，是不息历史中汨汨流淌的服饰之河。

中国服饰究竟生于何时已不可考。从辽远年代出土中我们看到的已是成熟的衣裳。于是，我们可以想像，至少比结绳记事更早的年代，服饰就同人类初生的脚步一道发出过成长时欢快的声响。

有案可稽的是轩辕黄帝。史书上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也就是说至少从黄帝开始，中原文明已经用衣裳之制完整表现了。那么，黄帝时代的衣服是什么样的呢？据说，黄帝和他的黎民们上著黄衣，下服黑裳，是农耕时代常见的短打扮，且是容易印染的颜色。当然服色的选择也不是随意的，古书说：“天玄而地黄”，黄帝的服色“取之乾坤”，于是黑

色和黄色便与自然相契、与天地同一了。

顺便提一句，黄帝的黄色本来是天地自然的颜色，与惟我独尊的皇权意识无关，黄帝本人以及以后的几位圣贤都未设车旗之禁，不搞服色方面的特殊化。可不知为什么，越几千年之后，隋唐时代，黄色就成了皇帝的御用颜色，百姓们从此无权过问黄色，甚至与各种亮丽的色彩都告别了，因为各朝各代都明文规定了许多普通百姓不可问津的服色，于是在数千年之间，下层百姓只能灰头土脸。

黄帝服制不仅衣黄，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垂”字。垂字有留传久远的意思，同时也表示垂长。它决定了中国服饰的一个传统，垂长飘逸而有儒者之风。遥想当年，黄帝及其子民的衣裳不可能垂长及地，有碍躬耕。但是岁月沧桑、物丰廩实，一部分人可以用智慧而不必用体力谋生之后，这种垂长就变得可能了。虽经春秋战国数百年战乱，然而中原流行的御长风骋驰千里的车战，并没有让长袍妨碍军务，所以袍服长衫发展下来了。即便后来又经历了三国魏晋南北朝连年烽火，凌风的袍服仍然保持下来并成为传统。

中国人最重传统。于是垂长便信守了几千年。除此之外还有宽大。很难想像垂长的衣服

是紧身的，因为紧身的长衣不仅外貌不够美观，而且不便于蹲坐。中国建筑在很长时间内室内家具是低矮的，甚或干脆无桌椅席地而卧，席地而坐。这种生活习惯决定了服饰必须宽大到适合跪坐、下蹲，起伏方便。所以，中国服饰的第二个特点形成了。从黄帝一直到溥仪，历朝历代服饰风格不尽相同，可是宽大与垂长一以贯之，历久不变。

往事越千年。

服饰之河缓缓流淌绵延漫长，积淀了多彩厚重的文化因子。秉承数千年传统之重形成的后代服饰便有了许多规矩、许多习惯。譬如男子绾发，女子发髻，譬如官服的等级区别、各阶层的服舆制度，这些规矩、习惯传至近代被淘洗成新的习俗影响至今。了解这些习俗因而显得重要起来。

近代是过渡的时代。从时间上说它包括了清代后一段，民国的几十年。从政治上说它既有君主秉政，又有军阀当权，还有民主共和的昙花一现。所以在政治上它是多元的。诸种学说、政见、主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反映到文化上必然七彩纷呈。过渡时代在思想上不免有浮光掠影的性质，但引起的社会效应、文化效应则十分绵长，于是，服饰出现相对繁荣。

加之近代服饰传统本来就有两个（明代服饰与清代服饰），更有西洋服饰影响，都使繁荣更为持久。

若与五千年服饰相较，近代服饰并非最为绚烂，因为服饰繁荣的基础必须是经济繁荣，而近代经济恰恰是凋蔽的，千疮百孔的经济不可能为服饰提供类似于唐代那样的大舞台，所以尽管同唐代一样存在着外来文化、传统两个方面的影响，却未出现盛唐那样空前的服饰繁荣。因之，近代服饰更多地在上海社会、城市以及有钱人那里推陈出新，之于百姓，之于广大农民，许多东西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大概也是近代服饰的一个特点。

到今天，近代服饰又只留下传统了。虽则如此，它却是五千年服饰文化中的一个环，再加上传承的明晰脉络依在，就使研究有了意义。

为了更好地知道今天，我们需要了解昨天。所以，《服饰史话》从昨天的昨天开始。

一 近代服饰的两个传统

有清一代，虽然割断了与明王朝在政治、血统上的联系，却并未割断与明朝在服饰上的联系。且不说官服因袭了明代的不少定制，光是汉族妇女便从明不从清，几乎照搬了全部明代服装。于是对近代来说，就有了两个服饰传统。

清代的男子服装属清制。1644年，满族少数民族以慄悍之势摧枯拉朽入主中原，近三百年国祚的明王朝被推翻了。改朝换代是在腥风血雨中完成的，所以，完全可以想像民族之间长期隔阂造成的文化差异、服饰差异引发的社会动荡多么剧烈。拿发式来说，满族男子从女真旧俗，头发半薙半留（薙：tì，剃的异体字）。什么是“半薙半留”？其式于额角两端引一条直线，将直线前面的头发全部剃光，留颅后发，然后编结成辮垂于脑后。这种发型与汉民族信奉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

伤”而形成的几千年辮发习惯大相径庭，遭到汉族人民抵制，故清统治者不得不以铁血手腕强力推行，这才有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血腥说法。经过多年的高压，清统治者终于把女真族的发式推广至全中国，并以此证明满族对汉族的征服最后完成。

发型之争不过是政权存亡的外在表现。明王朝虽不可挽回地失败了，可是以明为正统的观念并不像崇祯皇帝吊死煤山那样一了百了，后明的旗帜很长时间飘扬在大江南北。据说为了缓和矛盾，清朝统治者采纳了汉臣的“十不从”建议，即“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吏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倡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由于这个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避免了更残酷的民族迫害。

基于此，清代男服从清，女服从明。

清朝之制主要是褂，马褂，其外形与日后的中式服装大体相似。或者说，这种服制在近代继承下来，或多或少有所改良。

男子服饰中发辮最为特殊也最为讲究，贵族公子以至民间百姓全梳理得油光可鉴，有身分有钱的人还在辮梢上系八宝等物。这些东西

是用金、银、珠宝制成的各种别致的坠儿，系在辫梢上可使辫子减小摆动的幅度，不仅美观，还是家庭经济状况的证明。男子的辫子同王朝的寿命一样存在了二百多年，到辛亥年间它成了旧王朝的象征被“革”掉。所以近代男子发式没有任何传统依据，完全是革命带来的。

清代妇女服饰行双轨制，汉族妇女仍从明制，满族妇女则保留自己民族的传统。

明代女装是中国服装史上另一个灿烂时代。一方面明代社会经济比较繁荣，另一方面明太祖朱元璋定鼎之后宣布衣冠从唐而不从宋。这样唐代女服的文化因子必然对明有诸多影响。晚明以后，市民文学颇为发达，描写市井生活的小说也非常多，其中不少涉及到服装。《金瓶梅》里这样描写潘金莲：

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髻，一径里垫出香云，周围小簪儿齐插。斜戴一朵并头花，排草梳儿后押。难描画柳叶眉，衬着两朵桃花。玲珑坠儿最堪夸，露来酥玉胸无价。毛青布大袖衫儿，又短衬湘裙碾绫纱。通花汗巾儿，袖口儿边搭刺。香袋儿，身边低挂。抹胸儿，重重纽扣香喉下。往下看，尖趂趂金莲小脚，云头巧缣

山鸦。鞋儿白绫高底，步香尘，偏衬登踏。红纱膝裤扣莺花，行坐处。风吹裙袴。口儿里常喷出异香兰麝，樱桃口笑脸生花。人见了魂飞魄丧，卖弄杀俏冤家。

尽管这是文学描绘，但从服饰习惯来讲大体属实，反映了晚明城市妇女的时髦装束。其中提到的抹胸儿，在晚明小说中最为常见，它属内衣，似兜肚儿又像背心，多以色泽鲜艳的布帛为之，既美观实用又带些性感。

对后世影响大的是“凤冠霞帔”。凤冠霞帔是命妇的专利特权，普通妇女不得僭越。可到了清代，大凡结婚喜庆日子汉族妇女都著凤冠霞帔，甚至民国，甚至当代仍有人为了传统，为了民俗，为了讨吉利也“凤冠霞帔”一回。除凤冠霞帔外，影响大的还有比甲（或叫马甲），穿在襦裙之外，产生一种对比和层次，凭添美感。

清随明制，女装没有太大的变化，以致《红楼梦》中的女装与《金瓶梅》中的女装相差无几。不过受旗装的影响，汉族女装或多或少吸收了满族服装的特点，有关这个问题在近代服装中还会涉及，这里不作过多地叙述。

满族妇女的服装有明显的不同。她们从头

到脚都是风格独特的旗装。最典型的头发是“两把头”。所谓两把头是把头发束于头顶然后分成两绺，在头顶上梳成横长的发髻，后边的余发绾成燕尾式的扁髻，紧紧扣住后脖子，于是满族妇女总是挺胸直颈，别一副深沉模样。为了美，头顶上往往还戴一种叫做“旗头”的冠，多以青缎、黑绒制成，上缀各色花簪，走起路来风姿翩翩。旗装类似于后世的旗袍，只不过不讲究腰身合体，而是像男子长衫那样宽衣大袖。满族妇女都是“天足”，所以不穿菱鞋，她们的鞋在中国服饰史中最有特色，叫做“花盆底”，这种鞋中间高，两头悬在空中，也许是为了跪安、蹲安起伏方便，但走路则像踩高翘一样不易掌握。不过走起来与头顶上的旗头遥相呼应，再加上增加半尺以上高度，使每位满族妇女都高高挑挑，分外修长、沉稳和端庄。

近代的大半时间，清代服装保持不变。因为从社会性质上说，鸦片战争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开端，所以 1840 年以后的清王朝明显地与前期不同。可是从服饰文化上说，鸦片战争以后的 70 多年里，除了受西学影响而发生变化之外，其主体仍然是清代服装的延续。可以说明与清的两个传统是贯穿始终的，只不过越到后来影响越少而已。

二 近代服饰的两个走向

差不多都可以看到这个事实，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周而复始的。汉末、唐末或者明末、清末所有的社会关系的变动，商品经济的发达，在史书里的表述几乎都是一样的。假如你忽略王朝年号不计的话，很难判断它的确切朝代。人们在一个王朝中晚期欣然发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在那里茁壮地成长，要不了多久，这个王朝便土崩瓦解走向完结，萌芽也就随着已倾的大厦夭折了。

想一想，这种情形竟重复了两千年风烟岁月，人们脸上的笑意会尴尬地僵持在那里。是什么魔法使中国社会几千年一次又一次陷入回旋怪圈呢？这个人类发展史上的百慕大症结何在？怎样才能最后走出呢？

真正的僵局。

服饰也不例外。尽管我们可以无数次地看

到历代王朝末年的奢侈之风，无数次地从史书里读到各种形式的僭越以致于“天崩地解”、“纲纪凌夷”一类危词，也无数次地升腾起创新服饰风格的希望，但是，细察历代服饰，从宽袖到窄袖，从垂髻到高髻，莫不万变不离其宗，终无大的变化。所以《阅世编》才中肯地说，“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时尚随时变更，不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迁流，以新一时耳目，其大端大体终莫敢易也”。五千年服饰史尽管绚烂辉煌，尽管走出了中华民族服饰的大致模样，却也悲哀地陷入了僵局。

1. 僵局的打破

许多史学著作都一遍一遍重复着毛泽东主席一句有名的话：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也会缓慢地发展成资本主义。

原则上是这么说。

但我敢肯定，经济发展规律与服饰不一样。所以经济形态里可以期望到的发展在服饰形态里并不存在。几千年积累的经验，使我不敢寄希望于自然发展。对服饰来说，僵局的打破必须有外力，没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对其产生影响和作用，任何突破传统的变化都

极其困难。历史上有过几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或风习渗透的先例，而且，这些少数民族在饮食和服饰传统方面与汉族文化之间距离很大，按理说应该在中华服饰中产生大的影响，但是，这些周边少数民族不仅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于中原，而且在文化形态上也与中原文化有着较大差距。所以即使产生了影响，也不可能对中原的汉族服饰文化风格有持久的带有根本性质的作用。如春秋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只是成就了武灵王的伟业。再比如三国时代开始并持续了几百年的少数民族内迁过程，也只是在窄袖、裤子等方面对汉服装产生影响，两晋、隋唐时期人们对窄袖、长裤的偏好，也多由好胡慕异之风在起作用，流风一过，胡服的痕迹便烟消云散。

中国文化表现了惊人的稳固，尤其是加之于服饰之上的文化影响，使服饰也摆出了华戎之辨、夷夏大防。这就使任何微小的变化都会遇到各方责难和压力，谁愿意甘冒背离传统、背离祖宗的危险呢？

何况，中国服饰在那个时代还有朝气，还不致于因循守旧，恪守传统。真正停滞不前，缺少生机还是以后的事。

缺少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气息，缺少一个

能引起其他一切变化的契合点。

中外文化的冲撞

清中叶以后，一种全新的不同于中国甚至不同于东方的文化形象站在了中国国门之外。

初起的时候，没有人想到它会成为时代的界标。

其实，这个站在中国大门口的“新”文化并不是头一次来。明朝万历至清代乾隆年间，就有不少传教士自西徂东。光是有名的至少可以举出利玛窦、龙华民、艾儒略、罗雅各、汤若望、南怀仁等好几位。他们不仅带来了基督教的上帝，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历算，而且带来了对中国士大夫来说颇为新奇的自然科学。为了接近中国宫廷和骄傲的士大夫，传教士首先对中国文化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最先这样做并取得成功的是意大利的利玛窦。他华冠儒服，穿着中国人熟悉并且获得尊重的士大夫衣著，尽量地适应中国士大夫笃信文化传统的典型心态。当他想告诉中国人中国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便拿来了一个把中国的位置尽可能放在世界正中间的世界地图，用它来迎合几千年形成的“括四海”、“吞八荒”的“天下”观。其结果，中国士大夫愿意走近西方

文化了。接着他们又用译书修历去打动中国政府，于是传教士的影响终于传到了皇帝那里。

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中国之外的世界。尽管 1405 年郑和就率着巨大的船队到达了东非海岸。即便这样，乍一看利玛窦的坤輿全图，还是使国人大吃一惊，像对所有异端邪说的态度一样，立刻遭到了士大夫们群起攻击。有人骂道，九州之中中国理应居中，那个世界地图怎么能像利玛窦所画位在偏西一点？中国天下如此之大，怎么能像利玛窦所画只有那小小的一片呢？再往后，愤激的情绪演化成盲目的排外行动，再加上沿海不断地受到西方早期殖民主义海盗式的掠夺，到乾隆年间，终于通过了闭关政策，把那些带着基督和一点点科学知识的传教士以及西方文化全关在大门之外了。中国士大夫，坐在自己的天地里，继续重温着“括四海、吞八荒”的上国之梦。

第一次西方文化的东进草草收场了。

这次长达二百多年的西方文化的输入有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在服饰上又有什么意义呢？中国服饰的实质性变化必须有一种外力的推动，必须有一个全新的文化渗透和影响。这种推动和影响，在利玛窦他们那里是不是发

生了呢？

让我们先看看利玛窦之前的传教士们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成功。最早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是葡萄牙人，他们辗转至华，寓居在澳门。当时传教士有这样的规定，凡欲入天主教的人，必须先学习葡萄牙语言，取葡萄牙姓名，并按葡萄牙的方式生活……。从这些规定我们不难想像，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实在不可能有多少。到罗明坚、利玛窦时，他们已经乖巧得多了，罗明坚为了接近中国人把自己装扮成商人，而利玛窦则打扮成和尚，穿着法衣，并称教堂为寺庙。

在中国人眼里，商人尽管有钱但却没有社会地位，更无官府做护身符；和尚心在三界外，不问世事，这两种人对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都没有太大的影响。传教士们意识到，要接近中国文化必须先接近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的士大夫。于是利玛窦脱下袈裟，换上了华冠儒服，这回他真的成功了。

值得注意的是，是利玛窦换上了中国服饰而不是让中国士大夫穿上西洋衣服。利玛窦这样做并非出于对中国文化、中国服饰的热爱。从日后他写的《中国札记》里，我们看到在他眼里，中国人夜郎自大，骄情、无知而又傲

慢。利玛窦骨子里想的是用上帝的福音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但是，与其像葡萄牙人遭到拒绝，不如先取得中国人的好感从而能接近他们，接近他们中的文化精英，最好的办法就是说他们的语言，穿他们熟悉的服装去改造他们的灵魂。

所以，第一次西方文化大量的输入并没有引起中国服饰文化的新因素产生，相反地，却是借着中国服饰使中国人产生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从而打开那个闭固的大门。

一百多年后，关闭起来的门再一次被打开了。这一次，西方文化没有了华冠儒服的耐心，他们凭仗着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不再担心中国人的心态和情绪。

传入带着明显的侵略性质。

和明清时代的那次输入相较，上帝和科学都做了陪衬。西方文明的代表者更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之后的市场，销售和原料都需要这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市场。文化事业不是目的本身，经济才是最终和根本的目的。

不过，后来发生的所有变化都超过了目的本身。

这种现象在人类的历史活动中最常见不

过。欧洲人“地理大发现”时，并没想到由葡萄牙西海岸一直往西会有一个阔大的从一无所知的世界，他们是不甘于阿拉伯人对通往印度通道的独占才想到去寻找新航路的。无意中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从而重新认识了世界；麦哲伦发现了麦哲伦海峡从而证明了地球是圆的这个真理。人们会问，欧洲人为什么要去印度呢？可以肯定地说，最初是为了香料。后来的一连串伟大发现都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目的引起的。这些伟大发现还仅仅是对航路对世界而言，殖民主义到印度之后在那里引出的变化还没有提到。

去印度是为了香料，来中国则是为了市场。

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是为了开拓市场。他们并不曾料到，投下这块巨石竟能在偌大中国引起那么大那么多的变化。19世纪60年代，中国人也学着西方人的模样搞起了洋务运动。他们译西书、办工厂、开矿山，把洋务事业搞得绘声绘色。洋务派并没想到从此中国走上了工业发展之路，他们只不过想自强御侮，保住那个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19世纪90年代，中国人再一次学西方掀起了变法维新的热潮。他们译西书、兴学堂、办报